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5.024

从少年中国到中国少年:近代中国人少年观的形成与发展^①

王静雪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少年观,是人们对于少年属性及少年问题的总体认识,中国近代以来少年概念和少年观的演变,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的少年认识产生于对国家危亡的忧虑,经历了社会大环境的更迭与统一国家的建立,并在政治文化运动的熏陶下逐渐深入,最终形成反映社会变迁以及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培养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系统性认识,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少年;少年观;少年中国;中国少年;近代思想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5-0177-08

在近现代的思想意识上,少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但在我国近代以前,少年的概念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多数情况下是被作为与老年一词相对应的概念而存在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儿童、少年、青年这三个概念一直处于混用的状态。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入侵,近代中国完全陷于危难之中。在晚清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时期,寄托着对国家崛起的期望,社会上对于少年概念的认知出现了一次高潮,人们对少年的属性和与少年相关的问题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少年的形象有了新的划分与界定。这种新的意识与观念,从社会精英阶层中出现,向社会中下层延伸,为五四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对少年本身以及与少年相关的问题产生较大关注,也潜移默化地推动了五四运动中后期各种社团组织与革命活动的形成,甚至使人们开始关注下一代培养的问题,从而对当时

的社会与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少年观,亦即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少年这个群体总的看法与观点,其核心便是赋予了少年一词什么样的价值,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少年们所寄予的深切期望,目前针对近代少年观这一问题还没有太多相关的研究。倒是针对近代人的儿童观和青年观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近年来儿童史研究成果的数量逐渐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学界有关儿童史研究推进的影响^①。同样,也有很多学者深入研究、探讨了我国近代以后青年的概念以及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尽管学者们在谈及儿童与青年时,也常会提及少年,但大多都是一笔带过。有的在论述中国为何没有青年概念时尽管提及了少年的相关问题,但主要侧重于论述青年概念的变化,少年则少被提及^②。

目前少年观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分散且未成系统,主要有:针对五四时期以少年为名的组织

^① 收稿日期:2019-05-11

作者简介:王静雪(1994—),女,北京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东亚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① 相关研究参见吴效马《五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学术研究》2005年第7期;聂文晶:《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与国民性改造思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苏全有:《没有儿童的儿童史(上)——对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苏全有:《没有儿童的儿童史(下)——对近代中国儿童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刘珍珍:《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嬗变——以1870年至1930年间的文献资料为例》,《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邝海春:《中国为什么没有青年概念》,《青年探索》1991年第3期。

展开的研究^①;对民国后创办的与少年相关杂志的研究^②;还有学者就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进行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侧重点并不在少年观。如以研究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为例,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提出的“少年中国”是把一个抽象的国家理论转换成一个形象化的修辞技巧,这种将国家拟人化的手法是非常新颖独特的^③。尽管其对梁启超的少年观有所提及,但重点还是讨论梁启超文章的修辞手法。

总体来看,目前有关少年观的研究中很少提及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少年形象的认识与看法。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近代少年观的形成和变化做一个梳理,从而展示出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人对于少年形象的总体认识及其后续发展,以期为研究这一时期少年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些许新的视角。

一 少年与少年观:从词语到形象、再到观念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如同孔子所说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样以年龄而将人生不同阶段进行的划分,但这种划分方式与人类个体积累知识的过程有关,主要不在于划分人的实际年龄阶段,因而也就没有将少年从人生发展阶段中区分出来,形成独立的特殊概念。再有就是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史书记载,古代涉及少年儿童的时候多用“总角”代称^④,如《诗经·卫风·氓》中所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⑤;而根据具体的年龄又会有不同的称谓,如“垂髫”,即三四岁至八九岁孩童短发下垂的样子^⑥;又如“童龀”,即七八岁间乳牙脱落长出恒牙的时期^⑦。对于少年这一特定年龄阶段的群体,还没有一个统称。

到汉代,中国开始出现少年的概念,在《史

记》《汉书》《后汉书》中比较多见,主要是指年轻男子。如汉乐府诗《长歌行》中著名的诗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后世也有以少年替换少壮一词的。其与现代一般指年龄大致在11到15岁^⑧并且包括男女的少年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再到唐宋时期,少年一词的使用更为增多,意思也没有太大改变。如唐代诗人杜甫诗中就多用“少年”一词,如“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后出塞五首之一》);诗人李白则有“将军少年出武威”(《赠郭将军》)、“少年落托楚汉间”(《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夫子红颜我少年”(《流夜郎赠辛判官》)、“风流少年时”(《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等诗句;樊绰有“少年子弟,暮夜游行”的描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宋代刘敞有“人当少年时,耳目明以聪”的诗句(《公是集》卷十四),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诗中则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叹,苏轼曾自言“少年为《论语略解》”(《栾城集》卷七《论语拾遗》),吕本中《寄临川学者四首》诗中有“少年不努力,长大复何求”(《东莱诗集》),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有“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之语(卷一百六十六《炎兴下帙》)。这些大都含有年轻时、年轻人的意思。到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中有“人当少年时,用力于心思;中年时,用力于言行;老年时,用力于文章”(卷一)这样的对比,黄宗炎则有“少年子女风度都雅,天下美好之物”的表述(《周易象辞》卷十),可以说多了一些在年龄段上泛指的意思了。

由上可见,尽管在中国古代,少年尚未有特别明确而独立的含义,然而通过文献记载的描述,我们还是可以给少年这一特定时期一个相对宽泛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情况的标准:少年,是人生年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介于儿童与青年之间,即作为二者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过渡阶段内,人身

①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②王丽:《〈开明少年〉杂志研究》,中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马少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修辞与学理》,《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3期。

④王世明:《儒家生态观对当代青少年生态观培育的启示》,《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⑤周振甫注译:《诗经译注(修订本)》,中华书店2010年版,第80页。

⑥如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四所记载的“制曰:含齿之类,共知笃于爱亲;垂髫之童,莫不羞称不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12页。

⑦《左传·僖公五年》有“童谣云”,杜预注说:“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疏引《说文解字》云:“龀,毁齿也。男八月齿生,八岁而龀;女七月齿生,七岁而龀。”(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春秋左传正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6页)

⑧参见阮镜清《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与集体主义教育》,《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丹·葛根图雅:《少年期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特点及自我教育》,《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3期。

体的各项机能都开始初步发育,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开始从幼稚向成熟发展,开始向外界努力探索,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

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看,少年更多的被人们赋予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朝气蓬勃的形象,而这种少年的象征意义直到中国近代才开始明确展现,并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可以说,在近代不同的社会阶段,人们对于少年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少年们能否成长为国家、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新生力量,不仅取决于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受到当时先进思想传播及其受教育的程度和方式的影响。那么,先进的精英阶层们对少年群体有着怎样的认识,对他们有怎样的期望,赋予了他们何种深刻的意义,更多地成为那一时期相对主流的少年观。

因此,在晚清至民国初期,知识分子与思想领袖人物们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渲染他们心目中的少年形象,借以提出和阐明他们各种政治思想主张和文化主张。到了五四时期,以少年命名的社团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则更是有着“秉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这一宗旨像一道响亮的口号,借少年形象之意,用拟人化的手法,把当时人们希望和试图建立起的美好景象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也使得少年的形象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意义。

二 近代中国人少年观的形成轨迹

(一) 少年观的产生背景

可以说,1900年梁启超的一篇《少年中国说》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人们探讨少年和少年问题的先河。此后,少年一词在各种刊物中被提及的次数逐渐增加,被赋予的含义也与以往有了明显的不同。又可以说,少年一词从最初的象征意义到最后特指十几岁年龄的个体,其间经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随着近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少年的未来发展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对于少年的认识也更加明确。

人们最终意识到: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少年的概念一直未能与青年区分开来——这其实与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时,不同的翻译者因理解的不同而将“young”一词翻译成为少年或青年等多

种词语的含义有关——但少年及其形象在不断的变化中依然有其独特之处,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影响。可以说,晚清至民国时期少年观的产生及变化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清朝末期,朝廷上下、社会内部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也变得岌岌可危。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使得社会政治更是雪上加霜。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变革才能改变当时中国所处的困境,尽管他们由于所处立场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主张——如新政时期出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等派别之间的分立等,但他们力图通过变革改变当时中国所处困境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当这些变革努力不断失败之后,其所未能完成的历史重任自然被交付到年轻的下一代身上。因此,年轻人在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眼中就是近代中国未来的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同时,因为此时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刚刚觉醒的阶段,与处于人生成长期的少年阶段的许多特征极为相似,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在表达自己对年轻人以及对未来新的国家的看法时,也更加倾向于使用“少年”一词来代指,其象征意义跃然于纸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提到的少年其实有着很大的年龄跨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少年的概念实际一直沿用到五四运动前后,甚至到了周恩来、李维汉等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在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时候,就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也还没有使用青年这个概念。可见“在中国,少年与青年概念的分离,是现代的事情,而且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完成的”^①。这一点确实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人的少年观是在当时不同阶层的人们认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二) 少年观的形成及表现

近代少年观的产生,应当追溯到清末民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有了对于近代国家和社会崭新的认识与思考,近代化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变化也是最为活跃的。而且,在当时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少年最初是和救亡图存、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一阶段的人们对于少年的期望也更多地集中在国家前途和未来的层面,到后

^① 邝海春:《中国为什么没有青年概念》,《青年探索》1991年第3期。

来,人们探讨的主体才开始从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象征意义而转向少年个体发展的角度。

从近现代知识分子这一视角来考察清末民初这个时期的期刊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内容,可以使我们对近代中国人的少年观的形成及表现的历史过程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总体上说,近代中国人少年观的形成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演变阶段。

第一个阶段,清末民初,时局动荡,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后,西方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①,企图蛊惑人心,制造出一种中国社会已走向没落,只能任由列强瓜分的假象,这些言论也引得国内一些幼稚和无知者跟风,散布中国必将灭亡的悲观论调。当时的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驳斥这些言论,梁启超书写了振奋人心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并刊发在《清议报》上。梁启超文中说到:“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的概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定的话语表达和理论依据。在其慷慨激昂的文字背后,更是充分、明确地表达出了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思想家立场上的梁启超的少年观。

自严复将英国赫胥黎《进化与伦理》一书的前两章翻译为《天演论》并引入中国后,进化论的思想迅速在知识阶层传播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先进学说,也让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了解到认识世界的新方法论,即新旧交替的规律和后来者居上的可能。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提出“彼老朽者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的看法,第一次将少年与救国联系在了一起。梁启超认为,曾经强盛的国家日渐衰败与统治者的思想腐败、不思进取有着切实关系;与之相反,新生代的少年人则志气满满,“前程浩浩,后顾茫茫”“常思将来”“常敢破格”,这种品格是梁启超欣赏的,也是他极力推崇的。在梁启超看来,少年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同时,少年的存在如“朝阳”,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发源”,与老年人相比有着极大优势,因此少年作为一个主体,更应当珍惜这段宝

贵的时间,为了国家的未来努力拼搏。

再有,当时同样刊发在《清议报》的《今日少年》一文,也阐发了相似的观点,其作者提出:“夫以今日积弱不堪之中国而欲使之复强,已就灭亡之中国而欲使之复存,肩其任者不其难哉!不其重哉!……少年其努力哉!努力于今日哉!”^②由此可见,少年在当时人的心中是和命运紧密相连的。

从鸦片战争到清末,少年的意义大多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在知识分子们的文章中涉及少年的部分都较为抽象,少年形象更像是每位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与其说是对少年人的关怀,不如说是在描绘自己对国家未来的期盼与愿景。这一时期的少年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时人利用对少年人的期望,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其二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赋予少年一词以象征意义。有别于以往少年多作为年龄层面的概念使用,这一时期的少年主要代表希望,代表奋发向上,开始逐渐脱离于这一词的本身含义,转化为一种象征意义。

第二个阶段,随着1911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国家政治与社会思想都有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也使得当时的知识阶层更多地意识到社会变革不仅是政治上的变动,更应当是文化上、思想上和观念上的革新。自此,新思潮不断涌现。知识分子们对少年观念的认识更加清晰,定位更为准确,即少年群体虽然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新生力量,但因受到年龄和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少年的成长阶段仍然需要得到来自外界的正确积极的引导。

与此同时,人们比较普遍地意识到,人在年轻时就应当立志,并且还要严格要求自己。1925年《吟啸月刊》中的《怎样做一个少年中国的中国少年》就反映了时人对少年们的一些要求。

该文章的作者勤先提出,创造少年中国“自然要靠中国少年”,而成为中国少年则要具备两方面的品格。一方面,少年们应当“极力宣传人类的‘互助’与‘博爱’”,同时对堕落、虚伪的人们进行“精神的救济”;另一方面,少年们要积极“改造因循苟且的生活”,同时“提倡进取奋斗的生活”。若是均能做到即可说是具备了少年应有的精神,而具备这样的精神的少年如果遍布全

^①参见梁启超《本馆论说:少年中国说(附中国少年论)》,《清议报》1900年第35期。

^②《瀛海纵谈:今日少年》,《清议报》1900年第66期。

中国,那么近代少年中国的梦想也就不难实现了^①。

同样,《善导报》的《告少年文》也对少年寄予厚望,文章提出“少年有少年之精神,少年有少年之作为”,少年是“蓬蓬勃勃奋发有为者”“宜行在四方志在千载”。而有着少年精神的年轻人,应做到“其心以兴邦为怀,其念以牺牲自任”^②。

除此之外,在当时引领新思潮的《青年》杂志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少年之“十不可”,作为一整套的行为约束,即“不可傲慢尊长”“不可茫无定志”“不可自视等闲”“不可熏心利欲”“不可漠视公益”“不可眷恋家乡”“不可疾言厉色”“不可畏难却步”“不可藐视上帝”^③。这是对少年的行为举止提出具体而严格的要求。其中既包含道德层面,也包括信仰层面,比较多地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有所追求的精神指向。

由上可见,民国建立初期,人们一方面看重少年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同时也开始关注和思考作为人而存在的少年群体的未来发展问题,并从不同角度阐发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既包括对少年群体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知识分子对如何培养下一代问题开始的新思考。

第三个阶段,到了民国中后期,论者们对少年群体提出的要求变得更为实际,也更加关注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培养问题。尽管这一时期依旧战乱不断,但是在许多思想先进者对社会发展和进步迫切要求的前提下,也对新一代少年人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关于如何才能成为优秀的少年,《新少年》杂志的创刊可以称为一个标志,此刊所登载的文章《怎样才是“新少年”》一文,在以往对少年有严格要求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新少年”这一新的称号。此文作者认为,就少年而言,“读了书只知道死记,或者连死记的工夫也不肯下,一转身马上还给了教师”“明明有一双手,但是懒得劳动,不愿意去揩一张桌子洗一件衣服”“生长在一处地方,但是不明白那地方的各种真实情形,遭逢着一个时代,但是不明白那时代的各种真实意义,只是糊里糊涂,好像生活在梦里一般”,这样的行为表现都是不能被称为新少年的。那么何谓“新”呢?

作者进一步认为,新少年应当了解“自己所属的国家是被压迫的中国”“目前所遇的年代是世界战祸即将爆发的一九三六年”,应当明确认识到,“害怕和退缩只是走向灭亡的路径,惟有昂头挺胸,向前奋进才会战胜黑暗,望见光明”^④。只有带着这样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去奋进和战斗,有所作为,才能被称之为“新少年”。

《青年》杂志上也出现“新少年”的提法,例如所刊登的题为《新少年之好模样》一文中认为,作为“新少年”,行为举止应当是这样的:“衣服取便捷,不专仿效时式。见长上平辈,具能遵行旧仪。烟卷酒杯不沾唇。在常人前不操外国语。过妇女不游目。平居谈论不议时政,不评人短。不轻易摘书报之短处。足迹罕入茶园酒肆。向友伴不勾肩搭背作轻狎之状。遇下等社会有可恶之举动,不破口骂更不动手打……”^⑤,等等。

可以看到,上述这些报纸杂志所刊载的文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时人对少年的认识和要求,即认为作为少年或新少年,既要志向上有远大抱负,思想上独立有自己见解,为人处事忠厚,又要脚踏实地,认真对待学习和工作,这样便可不受外界影响奋勇向前,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不懈努力,取得成绩。

总体来说,到了民国中后期,时人逐渐意识到,国家未来的发展不能仅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还需要进行教育改革,积极培养下一代,可以看出,此时的少年已经从象征意义转变为实际意义和具体要求。只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安定与富强。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吸收借鉴西方的教育方式后,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提出国民义务教育的设想,并主张大力兴办学校。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近代化发展。

三 近代中国人少年观的特点、价值和意义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人少年观的发展轨迹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人们关注和表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产生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

①勤先:《怎样做一个少年中国的中国少年》,《吟啸月刊》1925年第2期。

②沈杏初:《告少年文》,《善导报》1916年第51期。

③《少年之十不可》,《青年(上海1899)》1911年第14卷第8期。

④《怎样才是“新少年”》,《新少年》1936年第1卷第2期。

⑤慕庭:《新少年之好模样》,《青年(上海1899)》1910年第13卷第1期。

也有所不同。下面将从有关论者的主体差异、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三个方面加以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一)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希望通过少年问题的讨论唤起国民的爱国意识

少年,最初被认为是“老大帝国”中的新鲜血液,是富有创新精神和远大志向的新一代年轻人,因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广泛传播而成为晚清的时尚名词,也令人们逐渐意识到“少年强,则国强”的深刻内涵。此时,一方面,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纷纷书写文章,赞扬少年勇于冒险的精神,也借以抒发他们自身的爱国壮志。另一方面,先进的年轻人竞相以“中国之少年”自称,自觉地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时代重任。受到这一时期先进思想的影响,大小改革接连不断,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推翻清朝统治,为实现国家独立奠定了初步的政治基础。

随着民国的建立,国家政治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此时少年的象征意义逐渐逊色于青年,人们开始更倾向于使用“青年”来代指年轻的群体。这种变化的出现,主要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尽管如此,由于少年的象征意义在之前的一段时期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爱国运动爆发时,少年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催人奋进的号召性动力出现。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19年由李大钊、曾琦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创办于五四运动时期,积极地召唤和广纳贤才,传播西方先进思想,而且力图团结全国优秀的年轻人,以期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了更好地“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进一步创办了《少年中国》杂志以宣传学会的思想,并将外国文学、诗歌等的相关内容介绍给当时的中国社会,这对近代和现代思想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知识分子作为主导,间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最初的国民教育思潮的提出到以受教育年限进行少年期的划分,再到增加办学力度、兴办杂志科普文化知识,等等,少年的教育问题,不断从理论探

讨逐渐地转变为更加实际的推广措施方面。

一方面,最初提出国民教育概念的是清末维新人士,他们认为国家的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教育的普及则应当从幼年时期开始。如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中就有所提及,他主张培养公民,以成为“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义务、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毅力、尚武等观念”的人。这种思想观念最早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如康有为在1898年的《请开学校折》中首次提出了“国民学”一词,他主张“创国民之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毕业,其不入学,罚其父母”^①。不难看出,这里提到的国民教育概念与现今的义务教育十分类似,既认为教育涉及全体国民,又强调人们应当从小就开始接受教育。梁启超继承并发扬了康有为的教育思想,1902年发表《教育政策私议》对义务教育进行更细致的阐述,主张“对6岁至13岁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凡千人以上市镇村落设小学校一所。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学校收少量学费,对贫穷子弟无力交纳者以豁免”^②。这种观念成为早期素质教育的雏形,也为“义务教育”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看来,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因此,他们吸收和借鉴西方的教育方式,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从而提出国民义务教育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大力兴办学校,普及文化知识。这些方面都增强了当时人们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

民国建立之后,时人吸收借鉴前人思想,在教育问题上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例如在1921年的《青年进步》杂志上刊登了《何谓少年时期》这样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儿童正式教育的年龄,大致可以分为五期,即(一)稚年初期:六岁以下;(二)稚年中期:六至八岁;(三)稚年后期:九至十二岁;(四)少年初期:十三至十六岁;(五)少年后期:十七至二十岁^③。

由此说明,此时的教育观念已经发生明显改变,受此影响,少年期也开始有了新的划分和界定,说明根据不同年龄段,教育活动也变得更加具

^①王丽君:《近代国民教育思潮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相关研究参考王丽君《近代国民教育思潮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③徐松石:《何谓少年时期》,《青年进步》1921年第41期。

有针对性。而且该文章还特别强调:在各期当中,儿童具有特殊的生长状态,“而生长状态之最形复杂者,则莫若少年时期”。然而少年时期,“乃由童稚而变为成人之过渡时代”“且习惯养成亦是时为最易”。那么“儿童将来之品格如何,多视少年期所受教育之性质如何而定”^①。这样,少年期教育上的特殊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换言之,在五四运动之后,受到前人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少年是最容易养成各种行为习惯的时期,所以应当对于少年的教育更加关注。也因此,论教育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关心少年们的健康成长。除大力兴办学校外,自民国中期开始,针对少年们而创办的报刊、杂志大量涌现,仅是以“少年”命名的相关杂志就有五六种,其中以《少年时代》《中华少年》《开明少年》《少年画报》四种刊物最受欢迎,也可见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运用新媒介关注少年的热忱之高。

(三) 主体转向少年人,提高少年群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度

与青年相比,少年群体虽人数众多,但是清末民初社会上开始使用的少年概念多以宣传救国思想为目的,其与少年群体自身的发展几乎无关,而且当时提出和标树“少年中国”的代表人物也大都已是早已脱离少年期的成年人。因此,真正的少年群体本身在具体的行动与实践缺少话语权,实际的参与度并不高。而当时的青年群体及代表人物由于受过高等教育,思想也更加成熟,自主性更强,受到的约束也较少,在开展青年问题的讨论时,既可作为亲历者感受社会环境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又可作为旁观者客观地分析探讨。由此形成了少年群体和青年群体之间的巨大反差。

尽管这种差异性从“青年”一词被频繁使用就已经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当“青年”在民国初期接替“少年”而成为先进群体的新代名词的时候,其实客观上也改变了人们看待“少年”的视角。就是从借“少年”之意表达自己对国家发展的期望,到关注新一代年轻人如何成为优秀的“中国少年”。也就是说,不再是纯粹形象化地看重少年的象征意义,也开始真正考虑当时中国的少年群体自身未来的发展问题。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少年群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度。其中一种表现就是从民国中后期开始,社会

上开始出现专为14周岁以下的少年们所办的报刊杂志,以加强对少年们在科学文化方面的指导。

以叶圣陶等人创办的《开明少年》^②月刊(1945年开始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为例,其是作为1936年1月创刊的《新少年》停刊近八年后而改名复刊的,其复刊正是在“一些青年”即“八年前的少年现在是青年了”寄信给叶圣陶等人,“诉说他们惦念《新少年》的心情”,还有一些朋友也鼓励叶圣陶等人说“那样的少年杂志现在很需要”,叶圣陶等人也更希望将其复刊。可见当时知识界对少年杂志影响的重视。因为距离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的产生已有近30年的时间,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沉淀,此时知识人的思想已经更加成熟且渐成体系,有着更为独到的见解,对少年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更为加深。《开明少年》的受众面主要集中在少年群体,如主编叶圣陶在发刊词中所说的:“读这本杂志的少年们至多不过十三四岁,对于以往八年间的事当然知道一些,可是未必记得清,认得清。以往的八年间,我们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在大变动中,那种大变动是从来没有的,到如今变动还没有终了。”又说:“读者诸君是少年,我们愿意诸君个个做开明的少年。”^③因为这一类杂志的创办者或是参与者大多都受到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潮的影响,更加了解少年们需要哪些方面的指导和培养,所以这类杂志可以说是专门为处于成长的懵懂时期、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少年们量身打造的。这些杂志以推广新文化和科学为主,目的在于对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进行正确的引导,而少年们在阅读报刊、杂志后,也可以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以投稿或是读者来信的形式传递给书刊的编写者。这种思想上的互动与交流,一方面帮助少年们完善自我认知,提升判断力,更为自主地选择接受外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让编者更清楚读者群体的思想动态,为未来的书刊编写指明方向。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当时的少年们切实参与新文化、新思想的学习和交流,在校门以外的社会层面的一个突出体现,从而能够切实地提高少年们自我认识的程度。

四 余论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以来少年概念和少年观

^①徐松石:《何谓少年时期》,《青年进步》1921年第41期。

^②相关研究参见王丽:《〈开明少年〉杂志研究》,2012年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③《开明少年》1945年第1期。

的演变,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突出体现为,在民国建立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知识界和思想界多将少年概念与救国图存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时期,少年的形象较为抽象,目的主要是唤起国民的爱国情绪,同时也抒发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人们对未来的憧憬。随着民国的建立,西方思想与我国传统思想进一步碰撞、交汇与融合,近代人对于少年的认识比古代有了更为明确的概念,少年的形象也逐渐由象征和抽象转变为具体所指的年轻一代人。一方面,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少年的含义比较宽泛,通常是包括青年的,有时甚至还包括儿童,并没有进行更加明确的划分;另一方面,少年的形象一直是奋发向上的,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因此人们对于少年也就有着非常严格的行为规范上的要求,这在当时的社会整体环境中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到了民国中后期,新思潮逐渐定型,少年教育方面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除加大了办学方面的力度外,针对十四周岁以下的少年们的报刊杂志纷纷出现,旨在从科学文化方面对少年进行具体指导。这一整体上的变化过程提示我们,少年形象在中国近代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当时的人们在意识中需要以年轻的群体来表示先进、优秀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少年与青年没有不同,所以当时在二者的使用方面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互通的。再有,尽管当时人们对于少年的认识是有所变化的,但他们对于少年们的期望一直是表现得很迫切的。

少年与青年在观念上的分离虽然是进入到现代才逐渐完成的,但在晚清至民国这一段时间里,人们认识中的“少年”与“青年”之间还是存在一

定的差别。“青年”这一概念的明确,主要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起始,知识分子对青年的关注逐渐增加。1919年北洋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更是引发大批青年学生自发成立团体和组织,唤起全国青年的觉醒,促使青年群体逐渐走上了历史前台。“青年”观念随之广泛普及。与此不同,在少年观产生的初期,即在受到西方社会学、心理学影响而真正划分出少年的年龄界限之前,少年所涵盖的意义一直是十分广泛的,那时的少年代表的的确是年轻群体,但并非单纯特指是十几岁的少年儿童。而且,就像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借少年之意表达自己对国家发展的期望一样,少年一词最初出现时,更多是代表国家、社会,在这里,少年的概念就是一种象征,包含了知识分子们力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的希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将少年的概念定义为“年轻人”,直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进行针对下一代培养问题的讨论时,才开始有人专门地将少年的年龄阶段划分出来,少年与青年概念也才开始逐渐分离。而中国少年和中国青年二者的特殊意义差别则显得更为突出并受到不同的关注了。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少年认识产生于对国家危亡的忧虑,经历了社会大环境的更迭与统一国家的建立,并在政治文化运动的熏陶下逐渐深入。最终形成反映社会变迁并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培养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系统性认识,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From Young China to Chinese Youth: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uvenility Perception

WANG Jing-xu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juvenility perception is about the general view of juvenile attributes and juvenile issues. The definition and perception of juvenil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o-political culture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conception of Chinese juvenility emerged during the national crisis searching for modernity, and was deepened with social changes, country unification and cultural movements. Engraved with social changes, the juvenility perception shaped a new education for next generation and gave impetus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juvenile; juvenility perception; young China; Chinese youth; modern thoughts

(责任校对 朱春花)